

周恩来对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贡献研究

宋 超

摘 要: 周恩来起草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互助合作,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奠定基础。他领导编制“一五”计划、“12 年科学规划”,率团谈判缔约《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运筹签署“156 项”、“122 项”合作协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合作项目的计划申报、实施、管理,决策和协调解决关键性重大问题;强调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扩散形成产业化,工业企业要重视产品质量和支农工作。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和领导组织艺术,对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深化发展和成效提高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2)5-65-03

作 者: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淄博,25504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S096)、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0YJA770044)阶段性成果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法律个体按照彼此约定共同履行国际条约或根据国际惯例,通过相互交流、配合与协作方式进行的科技活动,包括智力资源和物化产品的交流,经济性质的、非经济性质倾向的科技交流和技术援助等。^①建国初期中苏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156 项”、“122 项”协定,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科学技术合作,为制订和实现“一五”计划、“12 年科学规划”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撑。本文根据档案和史志资料,从领导计划、规划编制、起草签订条约、运筹协定签署,以及指导协调合作项目实施等方面,研究周恩来对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贡献。

一 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奠基

起草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包括合作内容,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奠基。中苏山水相连,科学技术合作优势得天独厚。新中国初期经济重建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1950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赴苏商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②1 月 22 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周恩来强调并详细解释“友好同盟”包含互助与合作,且后者在条约中应具体明确。苏方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思想在条约中得到充分反映。开始,苏方按照周总理的基本思想提出一个草案。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费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款文本,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所以说,条款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③

1950 年 2 月 14 日,周总理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④由于当时科技合作包含在经济合作之中,而且科学还常常同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条约也就成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第一块基石。

领导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工作,指示组建职能机构。新中国初期主要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重大事项更是由中财委会签外交部后直接请示周总理决定。1953 年 5 月,周总理批示成立政务院技术合作事务室,负责组织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统一对外联系,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国际科技合作事务的职能机构。1953 年 8 月,周总理指示在国家计委编内成立技术合作事务局,1955 年 3 月该机构划归外贸部。^⑤1956 年 3 月和 1955 年 6 月先后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 年 12 月两者合并组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 年 3 月技术合作局划归国家科委建制,设立国际合作局。从此国家科委成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的归口部门。

1954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7 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进行多次会谈,先后 4 次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代表团。^⑥10 月 11 日,双方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两国政府通过交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验,实现科学技术合作,互相供应技术资料、科研器材、派遣专家、留学生,以及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根据协定设立“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专门组织协调两国科技合作事务。该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总结安排合作项目的执行和计划,至 1966 年共举行会议 15 次。苏联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对他们备加照顾,各项活动安排细致周到。他对赫鲁晓夫说:这是“为了便于解决代表团(苏联)在各项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⑦赫鲁晓夫访华推动了中苏有规模、有计划的科学技术合作,^⑧同时扩大了苏联来华专家和中国留苏学生规模。“一五”期间苏联成套技术援助项目由 141 个增加到 156 个,决定赠送给中国全套机器装备,派遣专家帮助建设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示范农业机械化。^⑨

二 运筹签署“156项”和“122项”协定

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核心,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实际上,“156项”的一批建设工程在“一五”计划编制前苏方就已经开始帮助勘测设计。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不久,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给予中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技术援助的议定书》。苏方派设计组42人来鞍钢收集资料编制改扩建的总体初步设计,于1952年2月26日获中央政府批准。^⑩武钢投资规模仅次于鞍钢位居第二,1950年10月重工业部邀请马洛歇夫等苏联专家来大冶考察。1952年2月苏联黑色冶金厂设计院院长赫列布尼可夫应周恩来邀请率专家组来华,经再次考察论证,确定中国第二个钢铁中心应建在武汉、大冶一带。^⑪丰满水电站扩建设计的调查研究始于1950年2月,苏联政府派专家小组来华帮助工作,历时两个多月。时任东北工业部国外设计科科长臧乃光回忆“1951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援助的初步设计书陆续由苏联专家亲自携带来华送审。”^⑫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大型政府代表团访苏,就“一五”计划制定和实施向苏联政府征求意见。“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⑬,内容“偏重说明要求苏联援建的项目和愿望。”^⑭8月20日,中国代表团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周恩来阐述这次和苏联政府商谈的“一五”计划及其相关项目。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之所及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以帮助,建议派人来苏联学习以培养自己的干部和技术人才,指示有关部门与中方进行“一五”计划项目对口谈判。“橡胶是帝国主义禁运物资。斯大林把橡胶称为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希望我们自己培植打破封锁。周恩来详细介绍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资源条件,斯大林建议签订《中苏联合发展天然橡胶的协议》。9月22日周恩来宣布,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在完成这段组织安排中,周恩来真是呕心沥血。他煞费苦心地对每一个组的工作一项一项地分别进行了安排、指导和帮助。”^⑮

领导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1月毛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⑯周恩来提出,邀请苏联专家帮助,根据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编制规划。经中苏专家共同努力,当年底编制完毕,从此我国科学技术走向了有计划全面发展的道路。聂荣臻回忆:那时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周恩来直接问过,1956年8—10月,周恩来主持两次会议讨论《12年科学规划》,“经过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科学的发展方向。这是规划工作的主要收获,也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创举。”^⑰

周恩来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视为实现《12年科学规划》的主要途径,精心运筹签署“122项协定”。早在规划之初,周恩来就指出最迅速达到这个目标的六条有效途径,其中前三条都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内容。^⑱《12年科学规划》要求“要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某些重要的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上的国际合作的力量。科学技术国际合作的项目必须围绕本规划中的重点,首先注意最急需的科学研究基地的建立。”^⑲1957年5—10月,周总

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信函方式商定,中国政府派遣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率120人的大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执行周恩来和布尔加宁商定的使命。^⑳

中国科技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接见全体成员,详细了解他们的学历和经历,鼓励他们圆满地完成任务。^㉑谈判期间,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刘晓转郭沫若,明确中苏合作项目的谈判原则“在两国科学家交换意见后,如苏方来得及准备,政府也表示同意,可列入这次签订的协议中;如准备不及或有困难,则不要勉强,可先挂起来,留待以后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上再定。”^㉒会谈历时三个月,1958年1月18日郭沫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委主席Ю. И. 马克萨廖夫签订了《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研究协定》。该协定围绕《12年科学规划》列出122个重大科研项目作为合作重点,表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从以生产技术为主,发展到根据科学长远规划共同进行科学研究。

《12年科学规划》是苏联参与编制的,围绕规划进行“122项协定”的科研合作目标明确,双方准备充分,提高了效率和水平。正如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所言“十二年规划的制定是苏联参加提出意见的,与我们接触的苏联专家有四、五百人,在背后有五千多人参与此事。因此,苏方对我国十二年规划熟悉,对122项也就有准备。”^㉓《12年科学规划》于1962年提前5年完成,填补了许多空白科学。“原子能、射电天文学、石油化学、生物物理学等,在旧中国都是完全没有基础的,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并在苏联政府大力帮助下,已经初步建立相应的基地和培养了一些干部,并开展了研究工作。”^㉔

三 指导和协调合作项目实施

实施“156项”协定是中國大陸首次大规模、有重点的进行工业建设。它起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穿于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奠定基础。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周恩来强调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扩散,带动相关企业发展形成产业化。“一五”计划鞍山钢铁公司建设37项重点工程,其中规模最大在鞍钢以至全国影响至深的是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炼铁高炉“三大工程”。1953年12月21日,周恩来视察鞍钢并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高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祝贺鞍钢职工同志们这一伟大的成就。希望你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继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㉕鞍钢作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聘请340名苏联专家帮助编制规划、执行援建项目和担任生产顾问,选派干部、技术人员845人赴苏联学习。^㉖遵照周恩来指示和重工业部有关决定,1955—1985年向包钢、武钢、攀钢、宝钢、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等冶金企业、科研机构输送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13614名,仅1955—1962年鞍钢为包钢、武钢输送领导和技术干部4160人、职员1543人,并承担了攀钢的包建任务。^㉗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大部分是在“156项”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鞍钢一样,一汽、一拖等重点工程建设带动了相应产业发展。一汽建设聘请近200名苏联专家来厂工作,派出539人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㉘一汽承担了二汽的包建任务,试办托拉斯改

造新建一批专业厂。^②1955年10月1日一拖动工建设。10月11日中央提出“必须尽快地完成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并且尽快地筹备第二个和第三个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③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视察一拖时指示“你们要记着,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培养‘中国第一’的人才,创造‘中国第一’的业绩!”^④周恩来要求一拖不仅出产品,还要出人才、创业绩,带动拖拉机产业发展。1960年农机部开始有计划地改建天津、沈阳、长春、鞍山、江西和松江6个大中型拖拉机厂,一拖以提供图纸资料、代培技术人才和技术协作等方式支援兄弟企业。^⑤

周恩来深入实际协调解决工程建设关键性重大问题,要求企业重视产品质量和支农工作。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156项”中的大型多功能综合工程。1957年4月—1961年10月,周恩来三到三门峡,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召开现场会,分析决策和协调解决水库泄水孔底槛高程、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的设计制造、水轮机转子的焊接等争议大、难度高的重大问题。^⑥华北制药厂是“156项”中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1959年6月9日,周恩来在华药视察时指出“产品质量是个大问题,……应很好重视,发动工人、技术人员,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⑦1962年6月16日,周恩来由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陪同视察一汽,他要求一汽除组织汽车生产外,同时还有两项任务:一个叫支援农业,一个叫支援国防。6月26日一汽成立支援沈阳、长春两拖拉机厂技术领导小组,派出工具、齿轮、铸造、锻冶、产品检查、工厂设计等小组进行技术支援。^⑧

50年代末中苏关系走向分裂,周恩来及时调整合作对策,要求原则上合作项目少提为好,凡是国内有力解决或努力就能解决的任务尽量自己来做,不要列入计划。^⑨1959年周恩来就下年度中苏合作“122项”计划的申报草案指示说“我方提出的项目是否太多?是否恰当?是否合乎实际需要?请……再研究并精简”。同时国务院提出“聘请专家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聘请。”此后,我方申请项目以引进技术资料为主,仅在新学科专业和空白急需技术领域继续聘请专家、派遣实习生。^⑩譬如,自动底盘在我国缺乏设计和试验研究经验,就是使用经验也不多。根据我方申请,1960年苏方提供了伏拉基米尔拖拉机厂、明斯克拖拉机厂、全苏拖拉机科学研究所设计的ДСТ-28、ДСТ-45及ГС1.5自动底盘图纸资料,派“122项”学术出差专家2名来华工作。^⑪同时,中方派5名科研人员赴苏实习。^⑫1960—1966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在华专家,两国科学技术合作规模急剧缩小,以至完全终结。这期间周恩来指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原则,严格履行协议,细致安排新项目申请。^⑬

建国初期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是由政府组织的全面系统的大规模综合性的国际合作,对中国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影响深远。在合作过程中,从计划、规划领导组织与职能机构建立、条约协定运筹与谈判签署,到项目申报、实施协调及终结善后事宜处理,都凝聚着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贡献。

注:

①易继明:《论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法律意义》,《科技与法律》2003年第2期。

②③⑦⑪⑫李海文:《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

出版社2005年版,第75、60—61、194—195、129、134页。

④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⑤⑫王绍祺《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一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29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页。

⑧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г. Стр. 218.

⑨友谊农场史编审委员会:《友谊农场史1954—1984》,第549页。

⑩⑮⑯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鞍钢志1916—1985》(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545—547页。

⑪武钢志编纂委员会:《武钢志1952—1981》(上册)第12页。

⑬刘国光:《中国十五个五年计划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⑭⑰《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77、8页。

⑱⑲《聂荣臻科技文集》,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113页。

⑳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㉑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8—531页。

㉒王绍祺:《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二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㉓㉔㉕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7、103、330—331页。

㉖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鞍钢志1916—1985》(下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页。

㉗㉘㉙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1950—1986》(上册),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258、7、41页。

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8日。

㉛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志总编室:《一拖厂志1953—1984》(上册),第7页。

㉜宋超:《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对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影响研究》,《求索》2009年第3期。

㉝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编纂委员会《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309页。

㉞《华北制药厂厂志1953—1990》,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页。

㉟农业部外联络局:《中苏“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一九六〇年合作计划编制》,1959年1月—196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档案处档案,案卷—1960—永久—6,第42—43、54页。

㊱农业部外联络局:《中苏“122项”一九五九年度合作计划建议草案及有关简报》,1958年8月—195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档案处档案,案卷—1959—永久—48,第104页。

㊲农业部外联络局:《中苏“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一九六〇年合作计划编制》,1959年1月—196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档案处档案,案卷—1960—永久—6,第178页。

㊳农业部外联络局:《我部通过中苏“122项”规定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〇年派往苏联实习生卷》,1959年4月—196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档案处档案,案卷—1960—长期—4,第40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